



● 作者/Charles A. Kupchan ● 譯者/周敦彥 ● 審者/丁勇仁

美「中」新冷戰

A New Cold War Could Be Much Worse Than the One We Remember

取材/2023年6月大西洋月刊網站專文(*The Atlantic*, June/2023)

美「中」俄陣營間之對抗可能比美國與蘇聯間之冷戰更加危險。西方將面對一個從歐洲延伸到太平洋的專制陣營，迫使軍力分散相距甚遠。而共軍已有能力在西太平洋與美軍抗衡。華府需要仔細權衡利害關係，並持續建設性對話，將兩國關係引導至更積極的方向。

(Source: Shutterstock&)





(Source: 達志/Reuters)

—— 場新的冷戰似乎不可避免。中共與美國間之緊張局勢正隨著北京日益增長的實力與野心而加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破壞了該國與西方的關係，並使得莫斯科與北京更加緊密地聯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由美國主導的民主陣營對抗另一個由中共與俄羅斯主導的專制陣營。就像二十世紀時，華府正與歐洲及亞洲的盟友合作，以圍堵其競爭對手的野心。

然而，美國與「中」俄陣營間之冷戰可能比當初美國與蘇聯間之對抗代價更大且危險。華府不應該任由這種可能持續發展，而需要退後一步，仔細權衡其中的利害關係，並擬定計畫以避免地緣政治解體，因為這將大幅增加大國戰爭的風險，並使得全球化世界過度分裂而無法應對共同難題。莫斯科入侵烏克蘭是對全球秩序的挑戰。雖然美國與中共間





之關係尚未惡化至無法修復，但是中共不斷增長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將使其成為更值得關注的競爭對手。

實際上，中共是一個比曾經的蘇聯更強大的對手。蘇聯的國內生產毛額最高曾達到美國的60%。相比之下，按照目前的發展軌跡，中共的經濟預計將在未來十年內超越美國。此外，蘇聯一直無法跟上西方進步的科技，但是中共正在發展與美國旗鼓相當的高科技產業。確實，中共的經濟增速正在放緩，並將受到國內債務與人口下降等因素的拖累。然而，憑藉著相當於美國四倍多的人口，中共很可能到本世紀下半葉時，在經濟產出方面明顯領先於美國。

中共在地緣政治實力與影響力遠遠落後美國。但歷史明確昭示，當大國在經濟上崛起時，必定伴隨著擴張的地緣政治野心。中共正在這方面取得長足的進展。中共海軍擁有比美海軍更多的艦艇，且中共空軍規模位列世界第三。共軍已有能力在西太平洋地區與美軍抗衡。中共有望最終與美國並駕齊驅，成為世界上兩個全方位的超級大國之一。

中共的戰略地位也將受益於與俄羅斯合作。在冷戰時期的大部分時間裡，中共與蘇聯的立場並不一致，因此分裂了共產主義陣營。莫斯科無法與北京合作對抗西方。但如今，中共與俄羅斯是親密的夥伴。俄羅斯目前在經濟及外交上與西方隔絕，愈來愈依賴中共，此態勢能使北京在可預見的未來對克里姆林宮產生影響力。

如果出現新的冷戰，西方可能會面對一個從歐洲延伸到太平洋的專制陣營，迫使美國將其軍力

分散到兩個相距甚遠的戰區。俄羅斯及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部隊目前在歐洲近距離針鋒相對，美國與共軍在太平洋地區同樣有短兵相接的危險。已然令人生畏且危險的戰略格局可能變得更加嚴峻。

如果華府認為新冷戰會如同二十世紀一樣展開，一邊是民主國家，另一邊是專制國家，而西方占據上風，那將是錯誤的認知。在上一輪的東西方對抗中，地緣政治兩極化使得競爭變得可以預測與管控。兩個主導強權在維持平衡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了穩定；美國及蘇聯迫使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與其中一方結盟。民主陣營最終戰勝了專制陣營，使得西方能夠取得勝利。

相較之下，當今的世界變得更為多極化；即使全球再次受到新一輪東西方對抗的困擾，許多國家(包括新興的重量級國家)也可能拒絕表達立場。西方民主國家將發現，在多極化世界中，要建立一個對抗專制陣營挑戰者的優勢聯盟變得更加困難。國際體系也將變得更為混亂且不可預期，因此比二十世紀兩個陣營的世界更難以控管與穩定。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讓我們一窺未來趨勢。儘管克里姆林宮採取赤裸裸的侵略行為，但世界上超過四分之三的國家都選擇保持中立，在希望安然渡過戰爭對食品與能源供應造成破壞性影響的同時，也能夠避免陷入新一輪的東西方對抗。一些國家，如以色列及土耳其，正在保護他們與莫斯科的關係。許多其他國家也都維持與中共的良好關係，中共通過其一帶一路倡議在南半球大幅增加了經濟與政治影響力。如今，世界上約



民主政體印度未與西方陣營結盟，始終維持平衡外交政策基調。

(Source: 達志/Reuters)

有三分之二的國家與中共的貿易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在許多發展中國家，中共已成為首要的貸款提供者。

騎牆派包括印度、印尼及巴西等主要民主國家。在本世紀下半葉，印度經濟很可能會成為僅次於中國大陸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印尼可能會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四大經濟體，而巴西則很可能進入前十大經濟體。如果美「中」之間產生對抗，華府根本無法假設這些大國會支持美國，無論他們是否為民主國家。

儘管印度擁有民主制度，但

並未與西方或東方陣營結盟，而是試圖成為兩者間之橋梁及中間人。印度的外交部長蘇杰生(S. Jaishankar)最近解釋說，一個「仍然非常、非常西方化的秩序」即將終結，並將轉變為一個「多向結盟」(Multi-alignment)的世界。鑑於與中共的親近程度與貿易聯繫，印尼可能會更傾向於北京而非華府。根據澳大利亞羅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最近的一份報告指出，美國在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正不斷落後於中共。巴西總統魯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宣稱該國與中共的關係「非同尋

常」，並警告說「沒有人能阻止巴西繼續發展與中國的關係」。

至少就目前而言，美國可以指望英國、法國、德國及日本等長期夥伴成為堅定盟友。但是他們的全球影響力正在減弱。當冷戰結束時，美國及其夥伴國控制了全球近70%的財富。相比之下，預測顯示到2060年時，西方民主國家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的份額將不到40%。這似乎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如果新冷戰在這十年中發生，並且持續時間如同上一次冷戰，那麼情勢將要等到2070年左右才會開始趨於緩和。

此外，美國的傳統盟友可能不願意永遠集體對抗中共。許多歐洲國家與中共保持著獲利豐厚的貿易聯繫，並在華府與北京間之地緣政治角力中保持距離。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和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最近都赴北京訪問，並有兩國計數十名的企業執行長陪同。馬克宏在訪問期間引起了轟動，他表示臺灣不是歐洲的問題，而且「最糟糕的事情是認為歐洲人必須成為追隨者，並隨著美國



的節奏及中國的過度反應起舞」。

即使西方在對抗中共時保持團結，也必須考慮到自身的政治脆弱性。在原先的冷戰期間，西方大多國家在政治上是健康的：溫和的意識形態及中間路線在大西洋兩岸的自由民主國家占據主流地位，並以廣泛共享的繁榮為支撐。這種穩固的經濟與政治基礎產生了穩定且目標明確的大戰略方針，使西方得以戰勝蘇聯。

那些日子現在已經一去不復返。自動化與全球化對西方勞工的經濟福祉造成了沉重打擊，破壞了工業時代的社會契約。非自由民粹主義(Illiberal Populism)在大西洋兩岸橫行，溫和的意識形態及中間路線共識已經被激烈的極化及立法失能所取代。戰略穩定不再復見；美國的外交政策經常陷入政治博弈之中。除非美國與歐洲在政治上重新振作，否則民主將難以再度獲得全球的吸引力，習近平及蒲亭將有理由持續主張西方的黃金時代已然成為過去。

民主國家一次又一次地展示了自身的韌性及自我修正能力，此一紀錄使人們有理由樂觀地認為西方最終將恢復健康的政治運作。但與此同時，自由民主的蹣跚步履削弱了西方模式的吸引力及其勝過專制主義的能力。就目前而言，西方的首要任務必須是解決自身的問題——這是避免隨著新冷戰造成資源與政治資本消耗的另一個原因。

當今的世界，已不再如同第一次冷戰般一分为二，而是更加的相互依存。因此，地緣政治的再次分裂將造成更大損害。在二十世紀，儘管鮮少與蘇聯經濟往來，但西方經濟仍能蓬勃發展。相比之下，今天中國大陸已深度融入國際市場。如果

中共與西方斷絕商業關係，將會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破壞。美國已採取措施，將部分供應鏈自中國大陸轉移至友好國家，並限制中共獲取高端技術。如果對抗持續加劇，這種對中共有節制的經濟疏遠可能會加速，成為更廣泛的經濟脫鉤。

在這個相互聯結的時代，大國需要跨越意識形態分歧，不僅是在全球商業領域合作，還要應對其他共同的優先事項，例如阻止氣候變遷、預防流行病與促進全球健康、避免核擴散與軍備競賽、治理網路空間及管控移民。大國對抗的惡化將使解決這些迫切跨國問題所需的集體治理變得更加遙不可及。

歷史明確顯示，崛起的挑戰者與現有的霸主之間，競爭往往以戰爭告終。這並不是個好消息，因為中共的「原實力」(Raw Power) 很有可能很快就會趕上並超越美國。

隨著中共的實力與野心不斷增長，北京及華府將不可避免地爭奪主導地位。目前，無論美國或中國大陸，都存在著過度意識形態及零和思維，這些因素助長了相互敵意的螺旋上升。在美國，無論是民主黨人還是共和黨人，都還沒有準備好承認甚至考慮美國長期主導地位可能結束的可能性。狂熱的民族主義同樣影響著中國大陸的政治；習近平一直在利用與美國的鬥爭來鞏固其統治，並加強對國內的控制。

如果中共步入俄羅斯軍事侵略的後塵，無論是針對臺灣還是其他目標，一場新冷戰很可能就無法避免。但是我們還沒有走到那一步。美國與中共仍有機會形塑競爭的基調及強度，並將兩國關係引導至更積極的方向。



聯合國教育、科學及文化組織巴黎總部前方花園各國國旗隨風飄揚，交織出一片和平榮景。若美「中」持續對話交流，在多元意識形態與政治體制下共存，將會是世界大同的基礎。(Source: 達志/AP)

為了阻止且扭轉不斷升級的敵意，華府與北京需要持續且具建設性的對話，甚至可以努力打造一種共同領導全球的模式。但是邁向這條道路需要華府改變思維。美國例外主義的論述幾乎沒有給競爭對手留下任何空間，而新冷戰的未來太容易陷入既定的窠臼。拜登總統預見了一個由「民主與專制之爭」所定義的世紀，堅稱「獨裁者不會贏得未來。我們會贏，美國會贏。未來屬於美國」。美國及其盟國輕而易舉地贏得了第一次冷戰。華府現在可以故技重施，並贏得第二次冷戰。

但事情並不會那麼容易。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與美國治世(Pax Americana)以來，美國即將首次面對可與之匹敵的對手。如果美國及中共想要避免正面交鋒，而共同努力開創一個多極且相互依存的世界，那麼兩國將需要學會在一個意識形態多樣化及政治多元化的全球體系中舒適地相處。美國人需要發揮政治想像力，以便與另一個大國共存，儘管他們認為這個大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威脅性，而且與美國以救世主自居推廣民主的承諾背道而馳。另一種選擇將會導致棘手的地緣政治分裂及

全球混亂的加劇。

中共潛在的不妥協態度，加上北京與華府的辯論中充斥的對抗性民族主義，可能會迫使美國降低目標。若是如此，華府至少應該尋求與北京就限制與管控競爭的指導方針達成協議。例如，兩國可以規範雙方軍事事務間之聯絡，並將跨國問題(如氣候變遷、全球健康及貿易)與其他更嚴峻的問題(如臺灣及人權)劃分開來進行討論。

無論華府追求的是共同領導全球或僅是管控競爭，現在都正是開啟對話的時刻，因為美國仍享有經濟與軍事上的優勢，而二十一世紀的兩個超級大國仍可避免地緣政治破裂帶來的危險與混亂。

作者簡介

Charles A. Kupchan 是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國際事務教授，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高級研究員，並著有《孤立主義：美國保護自身免受世界影響的歷史》(Isolationism: A History of America's Hard to Shield Yourself from the World)乙書。

Reprint from *The Atlantic* with permission.